

中国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



中国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号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0 $\frac{1}{8}$ · 插页 2 · 字数 234,000

1962年11月第1版

196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80 定价(七) 1.50 元

统一书号 4001·281

前 言

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資產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範例。在本書中，我們對過去十二年的經歷作了一個概括性的介紹和分析。其中不免有錯誤和不全面的地方，希望讀者給以批評和指正。

本書於1958年10月完成初稿，經過修改，又於1961年改寫了一遍。

本書是在許滌新、管大同同志指導下，由吳承明、方行、梅瑩、汪士信執筆寫作的。在編寫初稿中，還有方卓芬、高云樵、梁思達、黃仁勛、胡鉄文參加。全書經許滌新、管大同同志審閱、修改。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研究室

1962年6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1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	1
第二节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它的特点	21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35
第二章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 和政策	51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51
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据	67
第三节 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	78
第三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	97
第一节 反对市场投机的斗争和国家统一管理财政经济工作	97
第二节 调整工商业	108
第三节 “五反”运动	121
第四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131
第四章 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	144
第一节 有计划扩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	144
第二节 工业和运输业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发展	156
第三节 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发展	166
第四节 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性质和作用	178
第五章 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190
第一节 个别公私合营的发展	190
第二节 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203

第六章 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212
第一节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	212
第二节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	226
第三节 公私合营企业的改革、改组和调整公私共事关系·····	232
第四节 个体商业的合作化·····	241
第七章 对资产阶级分子政治思想的根本改造·····	249
第一节 所有制变革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249
第二节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工商界的整风运动·····	259
第三节 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	270
第八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胜利·····	286

第一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三千年左右期间，中国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中断了中国社会独立发展的道路。近代中国没有能够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自然经济解体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西方资产阶级力图向中国伸展侵略势力、开辟中国市場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已经日趋腐败。为了防止人民和外面接触影响其封建统治和为了防范西方海盗商人的劫掠，清政府对外采取了闭关政策。这种政策是当时封建经济结构的反映。原来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剝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

換。”^① 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結合着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对于外国資本主义工业品的侵入有一定的抵抗力。当时对中国进行貿易侵略的主要是英国。十八世紀后半期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国本国的資本主义工业产品，沒有一样能在中国暢銷，它在輸华的商品中，60%到70%是靠印度的土产，主要是棉花。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对华貿易上經常处于逆差的地位，它們主要是依靠把大量的鴉片偷偷运到中国来攫取中国白銀，并用此来打开中国的門戶。

鴉片貿易使西方資产階級获得巨額利潤，但是对于开辟在中国的工业品市場效力不大，并且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事实上，資本主义侵略者要破坏中国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障碍，总是要假手于政治强力，像他們在印度一样。“在印度，英国人是当作統治者和土地所有者，同时应用他們所有的直接政治权力和經濟权力，为了要把这种小的經濟共同体破坏。……在中国，因为沒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帮助，所以[破坏的]程度还是更小。”^②

馬克思所指的这种政治权力，很快地就在中国建立起来了。1840年西方資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鴉片战争，1857年它們又发动了第二次鴉片战争，1884年又发动了中法战争。用武力打败中国以后，資本主义列强不但强迫清朝政府割地、賠款、开放商埠，并且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約，在中国取得了駐軍权、領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和其它許多特权，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和海关，壟断了中国的对外貿易和交通事业。

在这些政治、經濟特权的保护下，外国商品大量輸入。在八十

① 毛澤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8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2—413頁。

年代开始时，洋貨进口平均每年有七千八百多万海关两，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后，增至一亿七千多万海关两。进口除鴉片外，以棉紗、棉布为主，煤油、五金次之。在洋貨大量傾銷下，中国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首先是手工紡織业，逐步受到破坏。1880年到1890年，棉紗进口由十五万担增至一百余万担，許多手工織布就改用洋紗作經綫。据估計，1890年时全国土布生产中已有三分之一左右系洋經土緯。以后这一过程加剧，將緯綫亦用洋紗。同时，洋布也逐步排挤着土布。其它一些手工业也受到破坏。例如，煤油輸入內地，“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鉄大量进口，“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閑”^①等。另一方面，外国資本主义入侵后，起初絲、茶出口急速增加，刺激了国内絲、茶的生产。其后豆类、花生等出口也不断增加，刺激了国内这些經濟作物的种植。但是，例如絲的生产，过去往往是养蚕、繅絲都在同一家庭内进行，現在則多是将茧直接运往上海等地的絲厂，由外国洋行监制出口。茶、豆、花生等方面也有类似情况，外国洋行設有制茶、榨油等工厂，直接收购农民的产品。这样，农业和手工业的結合就逐步被破坏，中国愈来愈深地被卷入資本主义的世界市場，逐漸变成外国資本主义工业品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的供給地。

1894年的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統治阶级完全投降了外国資本，整个封建經濟和封建的上层建筑成为外国資本剝削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与此同时，西方資本主义列强也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資本輸出逐步压倒商品輸出而成为重要的侵略手段。結束中日战争的馬关条约，使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获得了利用中国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在中国設厂制造的特权。此后，各国对中国的侵略就由开辟商場变为划分势力范围——占領港灣，割据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紡織。

租借地，攫取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特权等。它们到处设立银行、工厂、洋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又通过大量的军事政治借款，进一步支配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权。

1931年起，帝国主义又开始了把半殖民地中国进一步变为殖民地的过程。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在日本壟断資本統治下，东北的经济完全变成日本本国经济的附属物，为它提供原料、半成品、指定的农产品和劳动力。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侵略全中国的战争。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最后才在苏联出兵的帮助下，把日本强盗赶出去。但接着，美国强盗又独占了中国。1946年美国 and 蒋介石政府签订了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全部中国的领土、领海、内河、领空都向美国开放，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勘察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

在中国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原来的自然经济不断地遭到破坏，基本上瓦解了。由于帝国主义掠夺原料的需要，商品性生产在农业中日益发展。而农民受着租税和债务的重压，甚至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口粮。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农产品的出售部分一般已占一半左右，有些区域高达60%到70%；农民的生活资料一般也有三分之一左右系购自市场。市场对农民的支配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直接间接波及到农民身上来。三十年代以后，在国内外种种剥削和压迫下，我国农村经济处于破产状态，农民到处流亡，人口和地主阶级的资金向大城市集中。传统的手工业也日益衰落，手工业者大批失业，变成无产者，勉强维持的也陷于债务，并受商业资本的支配。

資本帝国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經

济的基础，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場。”^①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一些使用机器的“商办”工厂出现。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将在下一节专为论述。

但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它们侵略中国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是违反它们的愿望的。这只是中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相反、阻碍这个变化的一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反动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封建剥削制度的延續 为了侵略的必要，外国资本主义首先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起来，把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供给封建统治者以军火和贷款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扶植封建军阀、制造割据局面以便利它们瓜分中国。它们到处致力于保持前资本主义的一切剥削形式——封建土地制的剥削、商业和高利贷的剥削以及各种奴隶制残余的剥削，并力图使之永久化。因此，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是破坏了，但是，封建制度剥削的根基——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0—621页。

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直到解放以前，我国广大的农村中，仍然是封建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残暴的剥削制度。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帝国主义者还竭力扶持着那里原来的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可以这样说，本来已经濒于崩溃的中国的封建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扶持，又“僵尸复活”了。只是它已不再是一种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被卷入国际资本市场，成为一种殖民地性质的农业经济了。

解放以前，在我国农村中，大约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70%以上，而占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占有全部耕地的不到30%。农民每年要向地主交纳大约700亿斤粮食的地租。地租形式以实物为主，劳役地租仍有相当地位，货币地租始终没有多大发展。地租之外，又有押租和顶付租，以及由佃户代负差徭赋税，提供无偿劳动和家庭服役，各种勒索等更为原始的剥削形式。土地占有愈来愈集中，经营则愈来愈分散，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农场的平均面积不断缩小。资本主义经营的农场绝无仅有，仅有的所谓农林公司或垦植公司，大都只是买卖土地的机构，或把土地分租给佃农。富农经济不发达，并且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带有半封建性。这都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农村中迄未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农牧业产品出口的品种不断地增加，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903年的26.8%增为1920年的36.4%，1930年的45.1%。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日益受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许多农产品价格都是由外国洋行壟断，像棉花与烤烟等并且有外国厂商直接在农村收购。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 为了侵略的必要，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了许多中国未曾有过的近代化企业。最早是银行、轮船公司、洋行和一些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船舶修造厂、出口品加工厂以及主要为在中国的外国人服务的企业等。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这种

投資已經具备了資本输出的性質，不仅是为商品貿易服务，而主要是为了直接剝削中国工人的剩余劳动。帝国主义銀行的性質也变了，它不再是中介人，而与产业資本合一，成为在中国进行經濟侵略的大本营。这时候，外国資本的数量迅速增长，投資范围也日益扩大。总的說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資，仍以金融、貿易、交通运输等商业性的掠夺資本为主，投資于生产者所占比重很小。这是因为中国是許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爭夺的半殖民地，只有在它們的統治比較穩定的地方(例如 1931 年以后日本之在东北)，外国壟斷資本家才大量地投資于生产。但是，仅这些已足以控制中国的工业了。在抗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資本壟斷了中国发电量的 76%，煤产量的 70%，鉄产量的 95% 以上，棉布产量的 64%，卷烟产量的 58% 和絕大部分公用事业。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資虽然是資本输出的性質，然而它們实际运用的巨額資本，却大部分是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資不仅获取了最大限度的資本主义利潤，它們还通过不等价交換的殖民地貿易，强制輸进鴉片和軍火，勒索战争賠款，霸占房地产和矿区等，进行着原始积累的掠夺。它們又利用发行鈔票、发行公司債、銀行存款以及引誘中国人入股等，吸收中国的資金，变为它們的資本。因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資，不仅是一种資本输出制度，同时又是一种資本掠夺制度。

帝国主义資本又不仅是高額利潤和資本的掠夺者，它首先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服务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銀行、洋行和工厂，并不是普通的資本主义企业，而是一种殖民主义的特权机关，它們执行着控制中国經濟命脉、直接压迫中国民族工业、阻止中国現代化的任务。許多大的企业不仅具有經濟特权，还具有財政、政治乃至外交、軍事的权利。像英国的汇丰銀行、日本的南滿

铁道株式会社，都曾經成为中国的太上政府；后期的“美援”和执行“美援”的机构，尤其是这样。帝国主义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造成中国經濟的对外依賴性，实现“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計劃，或者把中国变成“美国工业的边緣”。因此，帝国主义資本在中国的增长，絲毫不表示中国經濟的发展和生产的現代化；相反，它只說明中国經濟日益淪为国际壟断資本的附庸，中国民族工业日益受到压迫和限制，中国社会积累日益用于破坏中国工业化的目的。

根据主要是外国資產階級提供的材料估計，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包括企业財產、政府借款和房地產，在二十世紀开始时約合八亿美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增加到十七亿美元，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又增加到近四十一亿美元；其中企业投資，即在中国開設分公司或設立企业形式出現的“直接投資”，分別占总数的58.0%，58.5%，64.5%。此外，还有巨額的“庚子賠款”，其未付部分要由中国負担利息，实际也成为帝国主义剝削中国的資本。

投資的內容，金融、貿易、交通運輸(包括鐵路借款)三項合計，1914年約占41%，1936年約占50%；工礦等生产事業投資，1930年以前只占百分之十几，1936年連日本在东北的以掠奪中国資源出口为目的的工矿业投資合計，也只占20%左右。其余部分为房地產、一般政府借款及其它。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独占中国，外資的主要形式变成“美援”，即美国政府对蔣介石反动政府的“援助”。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8年，这种“援助”估計达六十亿美元，主要是軍事“援助”、財政借款和美軍在战争中的“剩餘物資”。美帝国主义以此武装蔣介石的軍隊，对中国人民进行內战。

九十三家在华外商企业的公开帳面利潤平均率是：1934年13.2%，1937年18.4%，1938年20%。据估計，从1894年到1937年，帝国主义国家輸入中国的企业資本合十亿三千五百万美元，輸入的政府借款合七亿美元；同时期，自中国汇回去的企业利潤合二十亿零八百万美元，汇回去的借款本息合十四亿二千九百万美元。

买办和官僚资本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又在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培植了为它们服务的官僚资本。早期的买办，主要是由封建社会的旧式商人和清朝特許专利的广东对外贸易商人转化而来的，其中很多是原来鴉片走私贩子。早期的官僚资本家，则主要是大地主阶级中带有买办倾向的一些当权派，即所謂“洋务”运动的主持者。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殖民地化，当权的反动军阀和大官僚日益买办化，同时一些买办也逐步爬上统治阶级地位，从而形成了代表买办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分别隶属于自己的主子——各个帝国主义。他们办了一批资本较大但很少获得成绩的近代化企业。他们替他们的主子，从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以便利其剥夺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它人民大众。

1927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叛变革命、建立国民党反动政权以后，又凭借这个政权的力量，利用战争、公债、赋税、专卖、金融和商业投机、贸易和外汇管制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发展起来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① 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时期急速发展，战后达到了最高峰。解放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259页。

业、交通、金融、貿易等近代化企业資本的 80% 左右。

金融和商业投机，是四大家族聚斂他們的資本的最主要和最先下手的方面。1928 年蔣介石反动政府一成立，就設立了中央銀行，同时控制了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随后又設立了中國農民銀行及其它許多銀行、銀公司、信托公司、保險公司等。利用銀行集中資金和外汇，发行紙幣，承購差不多有 50% 利潤的蔣介石政府为进行內战而发行的公債，并从事种种金融投机。1935 年实行“法幣政策”，利用紙幣把全国的白銀攬为已有，而把“法幣”变成英鎊集团的一員，后来又变成美元集团的一員，以美元为“法幣”的本位，并为此大量举借外債。这就完成了中国貨幣的殖民地化，使中国的金融財政成为外国壟斷資本的附屬品。以“法幣”为依据，濫发鈔票，造成延續十几年的恶性通貨膨脹，瘋狂地掠奪人民財富。据估計，在 1948 年发行“金元券”的半个月內，就掠去了黃金和外幣合一亿九千万美元。

金融独占支持了四大家族的商业投机，战争、内外債、外汇、黃金、地产、商品囤积、貨幣貶值等，都是进行大規模的投机手段。1936 年設立“农本局”，統制粮食、棉花的运銷；以后又实行貿易統制，对蚕絲、茶叶、錫、錫等重要物資的貿易进行壟斷，陸續成立了各种壟斷出口貿易的公司。1941 年又实行专卖制度，盐、糖、烟、酒、火柴等都由四大家族独占經銷。抗战末期，又設立了許多以“民营”形式出現的貿易公司，代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傾銷商品。抗日战争中开始实行田賦征实、征借和征購，成为掠奪农民的最重要手段；在抗战前开始的“农貸”，即四大家族的高利貸事业，也更加发展起来。

官僚資本完成了对金融財政的控制以后，就运用政權的力量伸乎到工业方面来。1935 年設立“資源委员会”，依靠美、德、英等帝国主义的資本和人員設厂开矿；又成立“工矿調整委员会”，用接管、加股等办法吞并民族工业。1935 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經營的工业企业（不計铁路机厂和电厂）还只有三十五个，雇工一万七千三百一十二人，到了 1944 年，已增为一百四十六个，雇工五万三千四百一十七人。抗战胜利后，又把敌伪的二千四百一十一家工厂收归“国

有”(其中有10%后来发还或标卖)。到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已经壟断了全国发电量的67%,煤产量的33%,钢铁产量的90%,石油产量的100%,有色金属产量的100%,水泥产量的45%。四大家族的其它机构还壟断了全国紡錠设备的38%,織布机设备的60%,糖产量的90%。交通运输方面,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輪船吨位。

四大家族所代表的国家壟断資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在資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壟断資本大抵是在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一般壟断然后进入国家壟断的。中国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则正是利用了工业落后和自由資本主义的不能得到发展,由大买办大地主的政治代表,直接利用国家政权,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它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中小資本阶级,而造成国家壟断的。这种国家壟断資本,除了具有一般壟断資本的壟断性、腐朽性或寄生性以外,其主要特征是具有深刻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它实际是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代理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工具。而在旧中国的条件下,壟断資本的形成又必然而且只能是以封建的农业生产关系为其支柱。四大家族,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总买办,是中国最大的农奴主和高利貸主。这种壟断資本,又表现着浓厚的軍事性质。战争一向是四大家族聚斂财富的捷徑,他们发行的公債也极大部分是投之于内战。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依靠政治强力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軍事的国家壟断資本,反过来又成为蒋介石政府的经济基础,成为蒋介石集团反动、卖国和好战性的主要经济原因。

官僚資本的这种性质说明了,它虽然是以近代化大企业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它并不是反映中国国民经济和中国資本主义的发